



性之耻， 还是伤之痛

CHILD SEXUAL ABUSE: SHAME OR HURT

中国家外儿童性侵犯家庭经验探索性研究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experiences of rural chinese families facing an
extra-familial child sexual abuse problem upon disclosure

龙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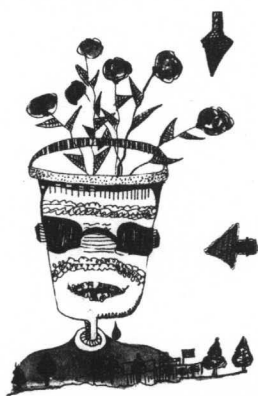
中国内地第一个儿童性侵犯的社会工作研究文本

- 深描特定时空下的个人及家庭创伤经验
- 解构中国乡村社会流传的“贞洁耻感”民间话语
- 扩展西方主流学术传统建构的个人心理病理专家论述
- 挑战普遍存在的“责备个人及家庭”的文化实践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性之耻， 还是伤之痛

CHILD SEXUAL ABUSE: SHAME OR HURT

中国家外儿童性侵犯家庭经验探索性研究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experiences of rural chinese families facing an
extry-familial child sexual abuse problem upon disclosur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之耻,还是伤之痛:中国国家外儿童性侵犯家庭经验
探索性研究/龙迪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633-6516-6

I. 性… II. 龙… III. 儿童—性犯罪—研究—中国
IV. D6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30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南里 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16.25 字数:350 千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一 社会建构主义质性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

第一次见到龙迪是在12年前。那是1995年的夏天，我在北大教书之余希望多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因此报名去《中国青年报》举办的“青春热线”当义工。龙迪当时是热线的督导，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热情、幽默、有见地。也许是因为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她的周围总是吸引着一群来自各行各业、愿意为他人服务的志愿者。在“热线”，我们一起组织和参加了不少活动，由于彼此投缘，很快便成了朋友。

后来，有近三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每两周见一次面，参加由我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讨会”。这个活动吸引了在北京的不少研究者来参加，大家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探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都感到受益匪浅。龙迪是研讨会的热情参与者，不仅从心理咨询的角度对很多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且对社会问题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在与她的交往中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2000年，我出版了《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一书后，她是最热心的推广者。她不仅向“热线”的同仁推荐，向自己的朋友免费赠送，而且让我存放了很多本在她那里，由她在合适的场合“推销”。我感觉，她对质性研究的热爱远远超过了我本人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而这与她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以及她的立场是分不开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后来她会选择质性研究方法做博士论文。

几年前，她去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虽然我们之间的直接会面少了许多，但我知道她在北方农村做儿童性侵犯的研究，而且还不时接到她从研究现场打来的电话。从她那沙哑、急迫的语气中，我可以感受

到，她在当地研究一个如此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会遇到何等的艰辛和困惑。后来，就听说她完成了论文研究。当她捧着两大摞厚厚的文稿、脸上带着无比自豪的神情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不仅从内心里为她感到高兴，而且为她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而叹服。

众所周知，这是一项很难做的研究。儿童性侵犯在当代中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难度很大。如何进入现场获得儿童及其父母的信任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如何获得“真实”的资料；如何知道获得的资料是“真实”的；如何用合适的方式言说当事人的故事；本研究对他们到底有什么用——这些都是研究中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龙迪采用了社会建构主义立场的质性研究方法。就传统意义上的“真实”问题而言，她的研究更加关注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际和群际“关系”及其交往是如何建构出特定“真实”的。她与被研究者通过不断的对话与协商，逐渐扩展了双方原有对儿童性侵犯现象、对自身及他者的生存状态以及对彼此关系的理解。这种扩展性理解反过来又改善了研究关系，进而又不断扩展了双方共识性理解的范围。选择社会建构主义立场的质性研究方法，还使她有可能在不伤害受害儿童及家庭的前提下，打开性侵犯这个敏感话题的“黑匣子”。

此项研究不仅在本体论、认识论上挑战了传统的研究范式，在伦理上照顾到被研究者的感受与利益，而且在方法论上超越了前人研究的局限性。当质性研究刚刚在我国系统介绍时，大家都非常兴奋，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研究人文社会现象的工具。特别是对那些畏惧或讨厌数字计算的人来说，质性研究方法似乎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救星”。但随着尘埃落定，泡沫散去，国人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质性研究是好的研究？仅仅对现象进行描述是一项好的研究吗？如何将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如何将前人的理论整合到自己的经验研究中，而不被这些理论所淹没？如何从少数个人经验和事件的分析中，提炼出研究者自己本土化的理论线索？

而龙迪的研究可以说很好地回答了上述问题。虽然她关注的现象是六个女童及其家庭的经验,但是她并没有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上,而是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将自己的研究与现有理论之间展开对话,从关注个人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转向关注建构这些心理现象及心理过程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过程。她不仅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述,而且超越了以往研究采用个人心理病理视角、呈现直线因果逻辑的限制,从系统一个人—文化(性别)—抗逆力多重视角,探索了自家女孩遭受家外性侵犯的中国北方农村家庭经验。她的研究在为我国的社会工作提供背景化、本土化的知识基础的同时,也为我国的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

此外,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研究还打破了一般人希望依靠技术创造奇迹的梦想。正如过分期望质性研究走向系统化、标准化和操作化一样,很多初学者都对目前开发出来的计算机分析软件抱过高的期望。他们以为有了软件,资料就不需要自己来分析了,自己的脑子和手就能被解放出来,繁杂的资料分析就会变得容易起来。而龙迪的研究告诉我们,这可能只是一个神话。她在尝试使用软件之后完全放弃了这个做法,因为她发现,计算机软件是建立在经典质性资料分析思路之上的,其基本假设是简约论,即任何有组织的实体都是由更小的单位组成的,只有被分解成不可再分的单元才能被理解。然而,家庭系统是一个不可简约的生命系统,一旦被分解成更小的单位分别探究,就无法获得充分的理解和解释。使用“分而析之”的简约论处理原始资料,很容易陷入西方个人主义研究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思维定势,描述个人层面的“行为”和“认知”,却看不到“关系”(包括被研究者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及其对“真实”建构的作用),更难凸显活生生的家庭故事。这个观点也可以被认为是质性研究中经典“扎根理论”方法的置疑,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建构扎根理论”的观点和方法(Charmaz,2006)。

因此,在本研究的资料分析中,龙迪没有使用计算机软件,也没有使用扎根理论的经典方法,而是采用了 Henry Wolcott 提出的“转化质性资

料”的策略:即先对原始资料进行“深描”,通过细节呈现本质和文化回声;继而资料中隐含的、有据可依的主题、特征及主题之间的模式化规律进行分析,将它们系统、有序地呈现出来;最后对资料的意义进行解释,建立知识宣称,达致理解的目的。她的论文比较清晰地呈现了这个分析过程,相信能够为质性研究的学习者提供一条不同的分析路径。

如果要将在研究范式上进行归类,很显然,它不是一项实证主义的研究,但也不仅仅是一项解释主义的研究。虽然它不能被完全归类到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即以实践认识论为基础、以社会改进为目的的“行动研究”(Argyris, Putnam & Smith, 2000),虽然龙迪经常受到自己是研究者还是助人者双重身份的困扰,但是她采取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赋予本研究以行动的潜能。社会建构主义将文本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将对话范围扩展到科学家群体之外,力图在更广泛的读者中架起协商和理解的桥梁。研究结果不再是客观的、只能用文字和概念来表达的“真理”,而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能够付诸实践去转变文化生活的社会行动。本论文不仅为读者建构自己的意义理解提供了空间,而且为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关注儿童性侵犯这类长期被忽略的社会问题扩展了对话范围,奠定了知识基础,进而有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发资源,展开合作,采取有效的行动。据我所知,龙迪本人在进行本研究期间和完成研究之后,一直在四处奔走,希望为那些儿童和家庭寻求更加实际、具体、有益的帮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龙迪有多年在新闻媒体工作的经历和身为家庭治疗师的经验,她的语言功底很好,文字优美、凝练、准确,富有感召力和形塑力——这也是一名优秀的质性研究者所必需的品质。相信读者会发现,自己的阅读是一次难以忘怀的拓展性对话,与文本,与作者,也与自己。

陈向明教授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

2007年3月15日于北京大学

序二 拓荒者的勇气

在学术圈里,对质性研究缺乏足够认识的学者常常低估了它对社会科学的学术贡献和价值。他们错误地以为,质性研究比量化研究更容易进行,一方面是它要求的样本数目不多,另一方面是其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方法看似简单。实际上,在知识的蛮荒之地,质性研究对开拓新知识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好的质性研究对研究者的理论基础、人际关系技巧、观察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语言能力等都有很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拓荒者的冒险精神。否则,研究者很难对相关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取得卓越成果。有鉴于此,过去在督导博士研究生时,我并不热衷鼓励他们开展质性研究计划,担心他们低估其学术要求,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不相信失败乃成功之母,而相信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当龙迪博士第一次认真地告诉我,她打算研究“华人家庭对家外儿童性侵犯的适应”时,我不禁暗暗佩服她的学术勇气。无他,在华人社会里,“性侵犯”这个研究领域仍是禁忌,可以公开讨论交流的平台委实不多。然而,我也坦率地表达了我的担心和疑虑。我担心她不能按计划接触到这些家庭。就算幸运地联络到这些家庭,由于“家丑不可外扬”,这些家庭也未必信任她,未必乐意与她分享他们的创伤经验。我不是不相信龙迪的能力,她当过7年的《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督导,过去工作接触面广,容易取得陌生人的信任。但是,她能否取得每个家庭成员的信任呢?尤其是受过伤害的孩子,创伤的经验使她们变得畏缩,害怕与陌生人接触,更何况是打开自己的心窗,让别人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回忆痛苦黑暗的经验呢?还有,龙

迪的理论根基够吗？

龙迪听过我的意见后，答应我仔细考虑我所提出的问题，一个星期后再决定是否放弃这个研究领域，转换新的课题。

一个星期后，她步入我的办公室，坚定地说：“马教授，请你支持我、协助我做儿童性侵犯的课题。我以往的工作经验让我接触过一些受害的孩子，她们太难了，我想帮她们，可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帮。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深入探索受害儿童各方面的需要，希望从社会文化角度了解家人的心路历程及其主观经验，从而协助他们面对和处理创伤。”择善固执，素来都是有成就的学者们共通的个人特质。我喜欢她的坚持，感受到她的热诚，也被她的理想所感动。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点头，表示支持。

龙迪的研究历程充满波折。她单人匹马，到北方农村进入现场，困难重重。她气馁过、沮丧过、愤怒过、悲伤过、无助过，但最终感受到无限的喜悦。她喜悦，因为研究历程虽然荆棘满途，但她终于有效地与受访家庭建立起互信关系，开始聆听到孩子们的个人故事，也亲身体会到她们的家庭生活，走进了她们的内心世界。

今天，我非常欣慰地看到龙迪的研究成果得以出版。这本书凝结着她的心血和成就，实践了一位年轻学者的梦想——开始在中国内地开展家庭社会工作。

家庭社会工作以家庭整体为服务对象，回应家庭面对困难所引发的家庭需要，以便提升家庭整体功能。专业评估与介入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层面，更要针对整个家庭，针对影响家庭功能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好的家庭社会工作需要两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第一是评估家庭需要的知识，第二是有效专业介入的知识。龙迪所做的这项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家庭在回应及应对儿童性侵犯事件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需要。这样，本土化的专业评估知识可以协助社会工作者，特别是专长于家庭社会工作及家庭治疗的专业人员，在做家庭评估时能够尽快理解遭受性侵犯的儿童及家庭的需要，而不必从头开始。不过，我们在帮助那些受害儿童及家庭时，仅仅

停留在理解层面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本土化的专业介入知识。但愿龙迪继续努力,学习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推动和发展祖国的家庭社会工作,协助建立专业队伍,裨益于求助的家庭。

马丽庄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
主席、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协会注册治疗师及督导)

2007年1月18日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

自序

从决定将博士论文研究范围限定在“儿童性侵犯”那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注定要面对无数来自内心及外界的挑战，并期待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人生的超越与升华。然而，当我画上论文的最后一个句号，静静地回首历时两年的研究过程时，却惊觉自己所经历的考验与收获远超出当初的预期。

我克服重重困难和恐惧，只身走进(近)六个中国北方农村家庭，一次次沉浸在他人“痛”与“耻”的创伤故事中，同时也经受着自己的生命之痛与创伤之耻。然而，正是在持续的聆听、理解和对话中，在面对“痛”与“耻”的过程中，在挑战自己“习以为常”的“想当然”中，本研究基本完成了对于中国内地儿童性侵犯现象的扩展性理解，而我本人也获得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理解、成长与升华。

在我眼中，学术不是象牙塔中的智力游戏，而是承载关怀、扩展理解、发掘智慧的工具。学术不是由“智者”掌控的话语霸权，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探索无常人生处境的谦卑努力。而我作为中国内地的一名社会工作专业学者，从事任何有关中国人的研究，既是我的荣幸，又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原谅我只能在此依次感谢那些直接陪伴我完成本研究的人们，尽管曾给我生命留下色彩斑斓印迹的远不止他们。由于本研究是我在香港完成的博士论文，所以请允许我按照先香港地区及海外后内地的顺序来表达我由衷的感谢。

香港地区及海外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马丽庄教授(Joyce Ma)。从系统理论来看,学生从事创伤研究所经历的挣扎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老师。然而,在我最低迷的时候,她总能用智慧、体谅和耐心,让我看到意义、价值及使命,并给予我切实可行的帮助。几年来,我跟随她做治疗、做研究、做教学、做采访,渐渐看到整合临床、学术和生活的希望及可能,渐渐学会怎样去把握古道热肠背后的界限。她给我的学术训练、临床训练和个人品质熏陶,使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能力灵活地应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巨大的情绪冲击,不仅收集到了系统、深入的原始资料,而且也没有危及受害者及我本人的身心安全。她总是带着好奇,在不确定性中探索“手指背后的东西”,激励我在本研究中不要满足于浅尝辄止。我还要特别感谢她打破惯例,先后派我到香港那打素大埔医院医务社工部、香港社会福利署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实习,使我这个接受过八年医学及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人,在进入研究现场前得到了处理虐儿问题的多部门跨专业合作模式的专业训练,因而才使本研究有可能跨越个人心理病理模式,更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梁玉麒先生(Timothy Leung)和吴丽端女士(Monica Ng)。我接触 Gestalt Therapy(完形治疗法)完全缘于我与他们两人的偶然相识。最初,我请求接受 Gestalt Therapy,只是想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它。然而,随着研究过程的展开,他们给我提供的治疗性支持渐渐成为我完成本研究不可替代的强大力量。作为治疗师,他们让我看到了治疗高手的风范:从不说“专业”的大词,而是用涓涓细流般的生活化语言,启动我自己化解创伤之耻、抚慰生命之痛的能力。每一次,他们似乎什么都没有做,而我的 self-awareness(自我觉察)却越来越清晰,我的生命选择越来越灵活,我的理想与现实越来越接近。作为朋友,他们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陪伴的感动、尊重的力量,以及善良与智慧的完美统一。我由此坚信,创伤康复是可能的。我由此坚信,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做好人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马斯洛语)。

当我越来越能够跨越个人以往的创伤经验，感受到内心的 peaceful and powerful(安宁与力量)时，我对六家故事的扩展性理解就像潮水般地涌现出来！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曾育彪先生(Bill Tseng)。作为助教，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学术的优雅与深邃，体会到了生命的灿然与动人。作为朋友，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不懈的支持与无尽的关怀。多少次，当我无法承受写作六家伤痛故事的巨大哀伤时，Bill总是愿意随时放下手中的一切，带着祥和、关切的目光，陪伴我在泣不成声中渐渐平复情绪，寻找继续努力的意义、力量与决心。正是由于他的鼓励和赞赏，才使我有勇气在写作最后一章时尝试加入文化分析，从而使论文增色不少。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石丹理教授(Daniel Shek)。尽管他不是直接指导我完成博士论文的导师，然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总是慷慨、耐心地回应我的任何请教，并在我最焦灼的时候，安慰我“慢慢来”、“不要担心”。初来香港的第一学期，我修读了他的质性研究方法课程。他肯定并赞赏我做质性研究的潜力，鼓励我尝试做一个好的质性研究。于是，我决定从“儿童性侵犯”这个“敏感话题”起步。

我还要特别感谢在香港期间为我提供多种专业训练的同行们。香港社会福利署家庭及儿童服务课主任张林淑仪女士(Cheung Lam Sook-ye)、香港那打素大埔医院医务社工部主任谈德荣先生(Victor Tam)和儿童精神科主任黎以菁教授(Kelly Lai)安排我到其部门实习，使我见证并感受到多部门跨专业合作模式处理虐儿问题的功效。上述两个部门的每一位社工和红十字会学校教师都尽可能为我提供专业训练的机会。特别是社会福利署临床心理学家林玉叶女士(Kindy)在百忙中抽暇阅读我对受害女孩的访谈文本，并提出了详细的改进意见；家庭及儿童服务课(东新界)的社工温佩娟女士带我去家访；那打素大埔医院医务社工部主任谈德荣先生及其同事温淑芳女士(Erica)多次带我去见习。虽然限于时空阻隔，我未能得到现已迁居美国的张锦芳教授(Monit Cheung)的直接指导，但她趁多次回香港举办有关儿童性侵犯

的工作坊之机,给了我宝贵的专业启蒙。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经历上述专业训练,我不可能保证本研究的深度及广度。

我还要特别感谢曾给我学术支持的香港地区及海外的其他学者们。我的好朋友、香港明爱屯门家庭服务中心主任陈美霞女士不仅持续地让我看到从事中国内地儿童性侵犯研究、开展专业服务的深远意义,还将她手中所有关于儿童性侵犯的资料借我阅读,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秦安琪教授与我分享她的研究。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Against Child Abuse)总干事雷慎佳女士热情地为我提供见习机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曾家达教授曾给我提出了宝贵的专业意见。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的陈高凌博士曾慷慨地指导我使用分析质性资料的软件。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的何式凝教授给了我深入了解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信心,并给我提出颇有见地的修改意见。通过经常与原香港大学心理系杨中芳教授讨论本土心理学研究,我在整个研究中都特别留心本土化的经验。在我进入研究现场前,美国再评价心理咨询国际协调人Welfler Patty女士慷慨地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意资助我到美国参加多个有关儿童性侵犯创伤治疗的工作坊。虽然我限于学制未能成行,但Patty的支持始终让我感到身后有强大的后盾。

我还要特别感谢几位在香港读书的中国内地同学在论文写作期间给我的支持与帮助。曾群同学总是愿意倾听我在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困难,让我在一次次认真、坦率的讨论中找到了解决办法。郁之虹、陈向一和徐文艳同学曾给了我许许多多情绪支持和生活照顾,让我在研究的孤独中感到与他们同在。

我还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办公室及大学研究生院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耐心、周到的服务性支持给我提供了数不胜数的便利条件。

我还要特别感谢香港突破机构原副总干事李兆康先生、国际训练总监李淑洁女士及突破机构荣誉总干事蔡元云先生,在我居港期间,他

们给了我许许多多精神关怀。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为我提供了三年全额奖学金，而且**谭纫就基金会**为我提供了部分研究经费，这使我可以衣食无忧地长时间地投入到研究中；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允许我用中文写作，使饱含文化含义的“地方性”语言有可能跃然纸上。我更要感谢整个香港面对 SARS 所表现出的沉着、勇敢的专业精神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教益和感动，激励着我克服重重困难完成本研究，并永远照亮我的职业生涯。

中国内地

尽管中国内地目前尚无专门部门为遭受性侵犯的儿童提供专业服务，然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却深深地感受到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强大力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我们跨越素不相识的鸿沟，在短期内建立信任，携手工作。原谅我出于保密原则，不能在这里一一道出在研究现场给我提供帮助的同行及朋友的工作单位。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地方晚报主任记者**栾俊学**先生。作为一名有社会良知的记者，他克服重重阻力，率先将参与本研究的六名女孩的“冤案”公之于众，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他理解我的研究目的及意义，慷慨地将他用信任赢得的“入场券”转赠予我，使我有机会走进（近）六个家庭复杂的现实生活。

我要特别感谢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雪梅**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张志毅**律师。他们不仅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法律咨询，还提供了许多实质性的专业援助。他们倡导社会公义的决心和专业能力不仅让我在研究现场感到巨大的团队支持，也使我对建立中国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工作模式充满信心。

我要特别感谢公安部刑侦局**祝燕涛**处长。2002年初，当我对儿童性侵犯现象尚知之不多时，她破例准许我免费参加由公安部、英国文化

教育处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京办事处联合举办的“反对妇女儿童性侵害中国警察执法培训班”。在那里,我不仅从三位英国教员(侦探)那里了解到英国警方的取证办法,还向全国各省厅级刑警负责人了解了中国警方处理儿童性侵犯的基本手法及收集资料的可能性,进一步确认了本研究的范畴与意义。

我要特别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的苏牧教授。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电影工作坊给了我很大启发,使我在呈现文本时,借鉴了电影的表现手法。

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心理与精神卫生学主任、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刘盈教授及其同事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进入现场的物质资源和关系资源,其硕士研究生吴枫同学还陪伴我首次进村,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集中收集资料结束后,她还欣然答应我的请求,无偿地为其中一名女孩补习功课,使我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工作上。

我在北京的老朋友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中国妇女报》权益部主任陈本建女士建议我采用现在这种进入现场的方式去收集资料,并提供相关资料。《北京青年报》记者乐倩、《生活时报》记者叶润霞、《中国青年报》记者彭冰和编辑汪文都曾为我收集资料献计出力。作为中国反对家庭暴力的专家,中华女子学院前社会工作系主任李洪涛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教授,不仅积极协助我寻找研究对象,还非常愿意与我分享研究心得,并协助我去争取进一步帮助受害家庭的国际资源。我第二次进入现场,带去了《父母必读》杂志主编杜迺芳女士赠送的有关儿童教育的杂志和书籍,使家长们感到社会关怀不仅来自于我一个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陈向明教授总是拨冗回应我所遇到的方法论方面的疑惑。

我由衷地感谢我曾供职七年的中国青年报社!正是在那里,我从父母身上继承下来的敬业精神自然地转化为社会责任感。正是在那里,我看到许许多多勇气、有能力捍卫社会良知的榜样,并学着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些经历使我在最困难、最挣扎的时刻始终不辱使命,成为我个人抗逆力(resilience)的重要源泉。

我还要感谢所有海内外朋友的包容！从进入研究现场那一刻起，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本研究上。我所写的文字、所谈的话题都与儿童性侵犯相关，对于朋友却疏于问候及关心。但是，他们不仅原谅了我，还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关怀，令我无比感动和欣慰。

我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生活馆主编龚风光先生及其团队。他们不惧儿童性侵犯的“敏感”，不仅欣然接受这部书稿，而且让我领略到，力图为读者呈现一个好的阅读文本的编辑过程竟然会如此高效，并富有创意！对我来说，与他们合作的过程实在是一段难忘的学习经历。

他们与我的家庭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参与本研究的六个家庭。限于保密原则，我不能在这里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然而，他们以信任和勇气多次赠予我走进(近)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的“入场券”，并用卓越的智慧与我共同建构有关中国儿童性侵犯现象的扩展性理解，这是难以用一个“谢”字表达的。能够在未来岁月与他们共同写下跨越创伤经验的新乐章，将是我赠送给他们的礼物！

我们中国人通常不对家人言谢，然而，我却不能不由衷地感谢我的每一位家人。在过去的四年半里，家中的每个人都在承受我的研究所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正是全家携手努力，才使得我们的家非但未因危机而消亡，反而在危机中得到成长。我赴港那年，我的丈夫陈小平先生正在北京创刊《新经济导刊》杂志。几年来，他身为总编辑，不仅陪伴年幼的女儿从幼儿园步入小学，而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不离不弃地给我巨大的精神支持和经济援助。我的父母和公婆均已年逾古稀，但为了帮助我出色地完成本研究，他们甘愿分担应由我承担的家庭责任。我的女儿也在与我有有限的交往中教会我从儿童的角度去感受、去理解、去表达。在一次次的分享中，我们一家人逐渐将自家利益与其他家庭的利益连在一起，将为自己的孩子与为所有的孩子连在一起，我们彼此之间的理解也随着对六家故事的扩展性理解而逐渐升华。论文写作尾